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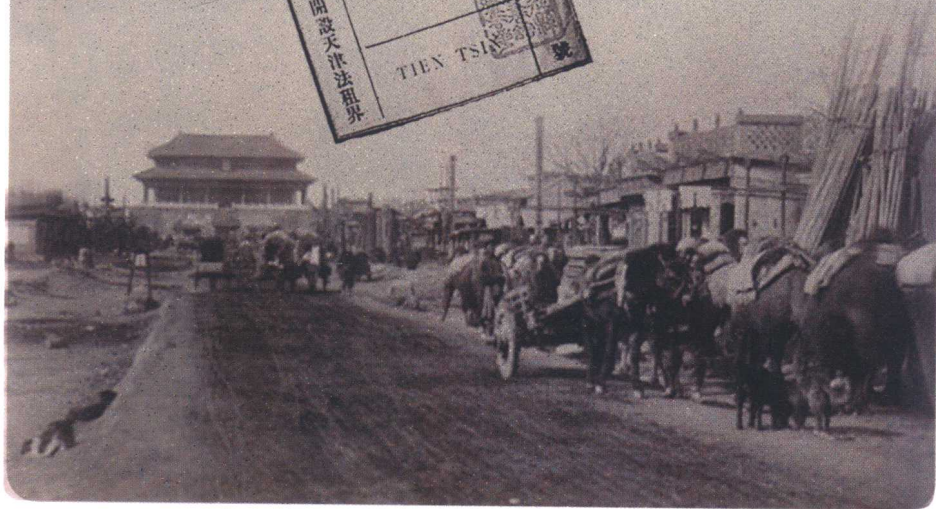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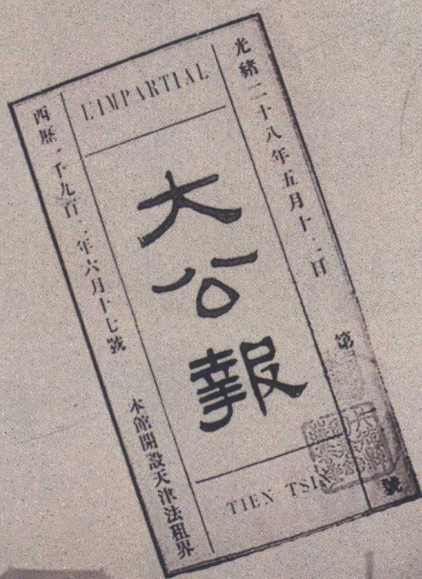
刘青松 著

天朝的天窗

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

一段中国人争取

言论自由的猛料历史



改良还是革命？百年思潮，一纸激荡 宪政还有多远？千差有路，一纸风行

上海三联书店

刘青松 著

天朝的天窗

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



上海三联书店

100338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 / 刘青松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6
ISBN 978-7-5426-3819-9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报刊—新闻事业史—
中国—1901~1911 IV. ①G219.2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8407号

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

著 者 / 刘青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260千字

印 张 / 17.75

ISBN 978-7-5426-3819-9/K · 176

定 价：3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	001
炮打武昌，打开一扇天窗	001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004
“不推翻此政府，则吾国决亡”	009
申报馆的玻璃窗被读者打碎了	014
第二章 慈禧，你该撤帘归政了	022
1901：看了洋人耍猴了吗？	022
耳目和妖言	031
“先进的中国人”严复	040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044
“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050
“立宪战胜专制”	056
第三章 革命其可免乎	062
“国与朝廷判然为二物”	062
“灭此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	068
“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	072
“君不革命非丈夫”	077
“革命当从暗杀入手”	082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087

第四章 改良与革命：中国何处去	093
向左走，向右走	093
要不要革命？	098
革命导致内乱？	103
革命导致专制？	107
土地国有，福祉还是祸根？	113
梁启超的尴尬	118
第五章 苏报案：当野蛮遇到文明	126
革命军	126
长枪大戟章太炎	133
专制起诉自由	139
舆论的胜利	144
《苏报》第二，国民第一	151
第六章 秋瑾案：当舆论唤醒人心	156
“国民女杰期无负”	156
“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	160
公愤与公理	166
第七章 报人彭翼仲的社会启蒙实验	172
慈禧送给光绪看的白话报	172
阅报处、讲报所和戏曲改良	180
“叫人人知道爱国”	186
“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93
第八章 报人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	200
《神州日报》：旁敲侧击	200
《民呼日报》：为民请命	206
《民吁日报》：鼓舞民气	211
《民立报》：助民独立	215

第九章 向皇权要宪政	222
立宪，立宪！	222
国会，国会！	228
“争吾辈天赋之权利”	235
第十章 对新闻审查说不	241
想籍口？没门儿！	241
一份争取新闻自由的联合宣言书	246
挤开的门缝	251
第十一章 官报批判自由民主	257
摊派发行的牛皮	257
“民主乱我数千年神圣之善法”	262
尾声 娜拉出走之后	267

第一章 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

炮打武昌，打开一扇天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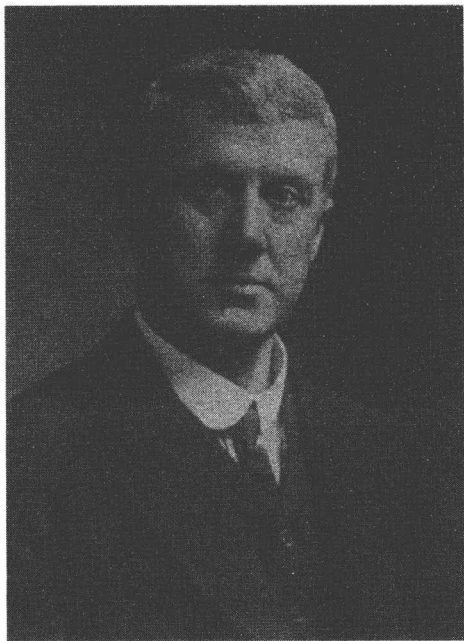
1911年10月11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家中餐馆，46岁的打工仔孙中山仍像往常一端盘子。当天，《纽约时报》和丹佛当地的报纸都披露了一条消息：中国武昌被革命军占领。

孙中山并不特别意外，也不特别兴奋。不久前，他接到黄兴从国内发来的电报，说武昌新军必动，请他速筹款应急。半年前，黄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捡回一条命。起义失败的次数多了，作为流亡革命家，孙中山显得更淡定了一些。他确实不知道，这一次起义，能不能避免重蹈覆辙。

这一天，河南彰德洹上村，三年前被解职后闲居于此的袁世凯心情特别好，当天是他52岁生日。他在养寿园大排寿宴，一边和专程来祝寿的亲信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人喝酒，一边欣赏戏台上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等京剧名角的助兴表演。

众人正在兴头上，来了一份关于武昌事变的电报。举座皆惊，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即下令撤下酒席，请台上戏子回房休息，他和亲信们围坐一起商议对策。他对众人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众口不一。有人说，大清危矣；有人说，不过是兵变，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要员都不在武昌，数日即可平灭；有人说，该是袁公出山的时候了；有人说，袁公千万别出山，帮朝廷平灭了兵变，保不准又来个卸磨杀驴。



“中国的莫里循”

袁世凯静静听着，不做声。

这一天，北京王府井大街，《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里循从居所出来，去拜访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斯。莫里循是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已经在北京待了14年，采访过袁世凯、张之洞等要员，在朝野和外交圈拥有广泛的人脉。莫里循多次在第一时间发出独家消息，使《泰晤士报》成了西方新闻界报道中国的权威，“中国的莫理循”广为人知。

莫里循从安格斯那里得到消息：武昌被革命军掌控，湖广总督瑞澂逃逸，第八镇统制张彪被杀（此误）。获得“猛料”的莫里循，又急匆匆去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朱尔典当天得到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报告：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已被焚毁。总督驻在中国巡洋舰上，此舰泊于英国炮舰的后面。

莫里循抓紧时间给《泰晤士报》发去一封电报，题目是《武昌的重大起义》，下有几个小标题：军队叛变 / 总督逃逸 / 要求外国援助 / 局势令人担忧。他写道，外国人拒绝向瑞澂提供帮助，认为革命党反清但并不排外。^①

这一天，北京城内很是热闹——《国风日报》出了号外，用二号字排出武昌起义的消息，市民抢购，奔走相告。朝廷慌了。陆军部、民政部、内城巡警总厅等机关极力封锁消息，“饬知内城各报馆暂缓登载鄂事”，并派出“检阅委员”实行新闻预检。

《国风日报》不吃这一套。这份当年2月面世的报纸是革命党人白

^① 参见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7页。

逾桓化名吴友石（无有氏）创办的，景梅九担任主笔。报纸公开的宗旨为“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懈弛”^①。报纸初创时，经常穷得揭不开锅，主事者只好敲敲朋友的竹杠，才能维持。“是时同盟会会员入京任职者日渐增多，白、景两人本隶同盟会籍，因此国风报社遂形成党人荟萃之机关。如田桐、程克、冷公剑、张友于、温楚珩等均寄宿于报社内。常川往来者尤众多，以新闻供给报社。由是《国风日报》在社会上以消息灵通见称，信誉日增，销路日广。”^②天子脚下，无法公然鼓吹革命，《国风日报》就打着“有闻必录”的旗号，通过客观报道，揭露清政府对外屈服对内残暴的大量事实。时评版极尽隐喻暗讽之能事，贬斥官场丑恶；副刊版则刊载南明掌故，介绍明末抗清英雄，发表蕴含种族革命思想的诗词。

当天晚上，《国风日报》准备好的武昌起义报道，被“检阅委员”要求全部撤掉，换上其他新闻。对白逾桓、景梅九来说，这显然无法接受。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国风日报》的读者们一拿到报纸，都惊呼起来——头版一整版都是空白，只印了一行小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③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扇天窗就这样打开了。

天窗一开，人心惶惶。京城内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很多人都在说，肯定是清军完了，革命党人大胜，不然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

当局无奈，只好跟《国风日报》打招呼：不再作新闻检查，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只要不造谣就行。

《国风日报》乘胜出击，每天大量刊登前线消息，鼓吹革命军声势壮大。北京满城风雨，清廷举朝惊骇，草木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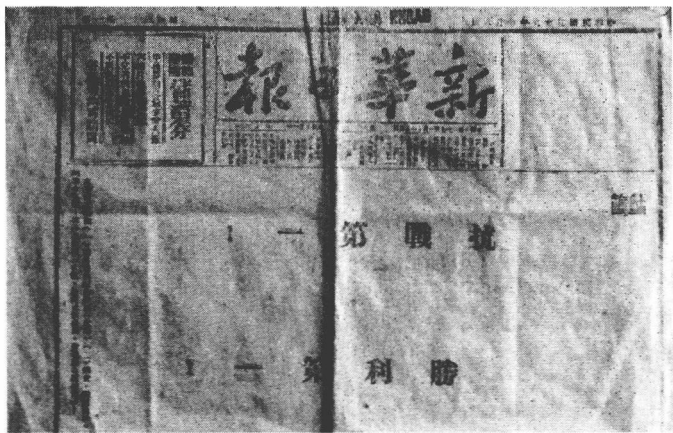
《国风日报》的天窗事件远近皆知，当时京城一家报纸特意为此事

^①转引自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②卢智泉、温楚珩：《记北京国风日报》，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③转引自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画了一张漫画，画上一个麻将牌局，有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



《新华日报》的“天窗”

《国风日报》之后，报纸“打出一张白板”之事，还发生过多起。《大公报》和《文汇报》都干过，最有名的当然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上的天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00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刊登了该报对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独家专访内容，在头版及二版各留下三分之一与半个版的空白。头版空白里一行字：“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二版空白里一行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绝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痲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

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是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是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署名“奇谈”）。

武昌起义，《大江报》不能不提。

当年，“九省通衢”武汉是革命派的一个宣传中心。1905年起，革命党人在这先先后后创办了《楚报》、《湖北日报》、《通俗白话报》、《商务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夏报》、《白话新报》等多家报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商务报》和《大江报》。

发刊于1909年10月的《商务报》，社址在汉口英租界，原为一家普通的商业报纸，创刊不久即因资金紧张，陷于停顿。此时，革命党人宛思演、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正谋划着办一张报纸鼓吹革命，宛思演变卖了祖传田产，筹到600多元，接手了《商务报》。新报纸版面扩大，詹大悲任主笔。

一个多月后，600多元的启动资金所剩无几，詹大悲也把家产卖了，维持报纸运营。困难之际，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投入一笔资金充作报社运营经费，《商务报》自此成为群治学社的言论机关。

有了“弹药”的《商务报》，“不特鼓吹革命，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而且“各同志受其熏陶者，无不益自淬励”。报社作为群治学社的秘密联络点，联络党人、秘密集会、储藏枪弹，都在此进行。《商务报》成为武汉报界“革命之先锋”。^①

1910年4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清廷欲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革命党人在报社内开会，决议乘机起事，分头准备。不料，却生了意外。此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正被各方质疑，《商务报》也大力抨击。主张借外债筑路的立宪派杨度路过汉口，《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刘复基和群治学社

^①参见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负责人李抱良跑去把杨度打了一顿，两人被巡捕房拘留8小时。如此一来，群治学社和《商务报》便被当局盯上了，官方强令与《商务报》合作的大成汉记印刷公司不得再承印此报，并函请驻汉英领事饬令报馆迁出租界。《商务报》被迫停刊，起事计划也泡汤了。

革命党人不死心，准备办一份新报。恰好富家子弟胡为霖手头有笔钱，正寻找投资机会，在革命党人梅宝玑劝导下，1910年12月14日在汉口创办了《大江白话报》。胡为霖自任经理，聘詹大悲、何海鸣为正副主笔。承印报纸的仍是大成汉记印刷公司。

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无故打死车夫吴一狗的事件，引起公愤。第二天，汉口1000多人力车夫在汉口英租界巡捕房门前向英方提出抗议，英军对抗议群众开枪，当场伤亡数十人。清政府为虎作伥，竟也出动新军镇压抗议群众，贴出告示：“有不散者，格杀勿论。”并要求全国报刊均不得报道评论此事。《大江白话报》不理睬禁令，以头号字标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事件真相，并配发《洋大人为何在汉口打死吴一狗》的评论，直陈“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清政府在英方压力之下，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企图为行凶者开脱，并威胁《大江白话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大江白话报》毫不畏惧，仍然如实报道，并将当局对报社进行威胁的经过公之于众。读者纷纷叫好，报纸销量增加，詹大悲也出了名。

报纸刚起势，麻烦却又来了。胡为霖父亲担心得罪了当局的《大江白话报》大祸将至，急忙把儿子召回老家。财神爷一走，报社运营难以为继。

詹大悲再次挺身而出，设法筹得资金3000元接办报纸，并将其更名为《大江报》。不久，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詹大悲出任文书部长，《大江报》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

当时，湖北新军中有很多文学社成员，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活动。《大江报》的革命宣传也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在各标营设置分销处，并免费赠报。《大江报》鼓励士兵们投稿，“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常写稿的人，还被聘为特约记者、特约编辑和特约通讯员。

《大江报》刊载了很多揭露军中腐败、反映士兵疾苦的稿子，比如新军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滥吃空额，克扣军饷，凌辱士兵，《大江报》根据士兵提供的线索，派记者详细采访，在报上公开。由于证据确凿，众愤难平，湖北陆军当局不得不把李襄邻撤了职。新军中的军官们对《大江报》畏之如虎，恨之入骨，而士兵们则把它看做自己人的报纸，每天去报社参观、报料的士兵络绎不绝。当报社资金困难时，士兵们纷纷解囊，捐款由各标营代表送到报社。

在《大江报》影响下，新军士兵中的革命意识越来越浓。文学社成立半年后，在新军中发展的社员达3000多人，加上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2000多名会员，新军中加入了革命组织的士兵人数已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士兵，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大江报》对国脉与民瘼大胆发言，被称为“专以骂字为主义”。当年，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大江报》发表多篇时评，对主张把路权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奉派接收商办铁路的督办端方、参与出卖路权的洋务人员郑孝胥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号召民众进行斗争。湖北布政使余诚格曾命度支公所以高息从洋人处秘密借得50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借款合同的副本，全文在报上披露。

《大江报》是一家不留辫子的报纸。当年上海《时报》有文称：“《大江报》馆总理、主笔、校对、会计诸人均皆剪发，与别报馆人不同，今春有人密禀，谓该报同人形迹可疑……”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刊出何海鸣（署名“海”）所作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痛斥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为“摧抑民气之怪物”，批驳立宪派利用请愿等和平手段促使清廷改革的意图之愚蠢，认定和平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几天后，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设宴为他接风。席间，詹大悲请黄侃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侃乘醉一挥而就《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这篇沉痛而激昂的两百余字的短文，引发强烈反响。当局再也坐不住了，于8月1日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



汉口，革命军士兵

的罪名，查封大江报馆，“永禁发行”，同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酿成辛亥年最大的一个报案。

在法庭上，詹大悲慷慨陈词：“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对于所谓“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他驳斥说：“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词曰和平解决！”他反问法官，“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当法官追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时，詹大悲平静地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我是发行兼编辑，一切责任均归我负。”^①

报馆被封的第二天，《大江报》同人就向全国发出专电：“各报馆鉴：敝报昨夕被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②三天后，又发表《报馆与官吏》，再表愤慨。

^① 《汉口大江报被封三志》，《时报》1911年8月8日。

^② 转引自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9月2日,《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声援《大江报》。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来到报社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纸条和哭吊短文。

当局本想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慑于舆情激愤,只好从轻判处有期徒刑800元了事,因詹何二人无钱也无意交罚金,才改判詹大悲服刑一年半,何海鸣服刑一年。武昌起义后,二人得以自由。

《大江报》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它被封后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爆发。

大成汉记印刷公司负责人、后创办《大汉报》的胡石庵有诗云:“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1912年6月10日,《大江报》复刊,詹大悲、何海鸣再共事。新《大江报》本其一贯敢言作风,对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及其党魁黎元洪痛加抨击,文字激烈,甚至有以“断头”署名者。黎元洪“床下都督”的段子,也在报上渲染。后来,《大江报》因鼓吹无政府主义,被黎元洪抓到了把柄,黎元洪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为罪名,派军警封报捕人,命令捉到《大江报》主事者,立即就地正法。詹大悲、何海鸣避走。

不过一年,江山易帜。不过一年,《大江报》又来了一次报案。

詹大悲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元老。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桂系清党时詹大悲被杀害。何海鸣在二次革命时,于南京代黄兴任讨袁总司令。后来,他成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晚年投降日寇,做了附逆文人,终遭遗弃,贫病而死。

“不推翻此政府,则吾国决亡”

1911年元旦,上海《民立报》发表短评《呜呼南报》,为仅出三期就被迫停刊的桂林《南报》抱不平:“呜呼!热血南方人,快招《南报》魂!”

无公理之可倚，惟铁血之可凭。山灵水秀毓苍生，头颅自有价，莫谓秦无人。”

字里行间，隐隐然一股杀气。

在杀气充溢的国史上，有太多“惟铁血之可凭”的刺刀见红的时刻，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

1911年4月8日，温生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就义。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5月14日，长沙万人集会掀起保路运动。7月31日，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时发布宣言称，过去革命党之所以不能战胜清廷，由于“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所以屡起屡蹶”^①。此后须听命总部，不轻易一发，培元气，养实力，同心同德，共造时机。

其时，宋教仁已是中国舆论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上一年冬天从日本回国后，他担任了《民立报》主笔，“署名渔父，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②。

保路运动初起时，宋教仁在《民立报》猛烈攻击清政府假国有政策之名，以图中央集权，暗中渔利，不惜把湖南、湖北路权交给洋人，东三省路权之失将再现，湘鄂人民必须自救。“四川风潮扩大，宋又勸勉川人，勿规规于消极的争路，应积极的为全国人民请命，将专制恶毒一扫而尽。”^③

与宋教仁呼应的四川报刊付出沉重代价。9月7日，四川《蜀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揭露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十大罪状被四川总督赵尔丰封禁，同一天被封的还有《蜀风杂志》、《白话报》、《启智画报》、《西顾报》，6月26日创刊、发行高达1.5万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也未能幸免。

一天内封禁6家报刊，在当年国内报界杀气弥漫的氛围中，并不令人惊讶。

①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③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1月6日,北京《公论实报》因其所刊《狗说》、《群狗竞争图》等文,讽刺了资政院的议长、议员,被罚令停刊7天,罚款30元。京城各报奋起声援。警厅恼羞成怒,加重对《公论实报》的迫害,1月9日,发出公告宣布《公论实报》“永远停止发行,并附科罚金百元”。第二天,《公论实报》在《帝国日报》刊登声明:“同人等受创虽深,此心不死,决为卷土重来之举,以收再接再厉之功。”

3月12日,哈尔滨《东陲公报》因触怒沙俄当局,被当地警局查封。3月17日,上海《神州日报》发表题为《论摧残报馆之适以速亡》的社论,谴责当局摧残“一线未亡之人心”及“仅存之舆论”。4月3日、4日,《申报》连载长篇通讯《东陲公报被封之悲愤录》,报道事件真相。

4月22日,刚出版两个星期的广州《可报》因为报道了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被当局封禁。两个月后,广州另一家报纸《天民报》寿命更短,只出版了两天,就以“冒渎乘舆”、“毁谤朝政”等罪名被勒令停版,主笔卢谔生被捕入狱。广东报界公会为此致电清廷,提出抗议,要求转饬地方当局依照《大清报律》规定的法律程序处理,“以重法权”。《神州日报》也就广东几家报纸遭地方当局迫害一事发声。《申报》则刊出《戏拟要求阎王延长报馆寿命禀》的游戏文字,嘲讽清廷对报界的不断打压。

“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神州日报》上一幅漫画的配文如是说。

明眼人皆知,清廷对报界的所作所为,显露出统治者权力运转的惯性,骨子里的野蛮和虚弱。“盖官权之无限久矣,出一言而莫予敢违,以习惯之所趋,而成为不文之法。今忽有昌言无讳之报馆,与立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而时时刺取不可告人之隐事,宣诸万众之听闻,恶其所为,则思去其籍。彼巍然民上之有司,其痛心疾首于报馆欲得而甘心以为快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①

不过当年,有多少报纸被禁,就有多少报纸新起。有的报馆昨天被封,今天就换个报名重新出山。以国土之广,你封得尽吗?以人心之众,你禁得完吗?

报人的智慧是无穷的。1911年2月,同盟会广西支部创办《南风报》,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205页。